

夏商周三代事略

张闻玉 曾 鹏 桂珍明 /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夏商周三代事略

张闻玉 曾 鹏 桂珍明 /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夏、商、周三代历史为研究对象,“正编”着重记述三代重要历史事件,“支撑材料”着重研究与三代历法、纪年相关的问题。全书力求做到史时与史事结合,对三代历史进行完整而系统的把握。

本书可供中国古代史领域的学者、学生及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和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商周三代事略/张闻玉,曾鹏,桂珍明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03-054199-4

I. ①夏… II. ①张… ②曾… ③桂…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三代时期
IV. ①K2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2193 号

责任编辑:范鹏伟/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张克忠/封面设计:天穹教育
编辑部电话:010-64011837
E-mail: yangjing@mail. sciencep. com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9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9 插页: 1

字数: 300 000

定价: 8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近些年来，在研习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我们有着这样的体会，按照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重新界定人类文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距今一万年前后，伴随着农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自身生产由族内婚向族外婚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形成，而国家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后到来的工业革命，以及后工业革命，包括早些时候的前农业革命在内，大体上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四个不同发展时期。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要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全新的、明晰的理解和认识。

具体地说，其中前五千年，可以作为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 80 世纪到公元前 30 世纪，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奠基阶段；相对而言，后五千年之中的前三千年，可以作为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 30 世纪到公元前 221 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而后的两千年，可以作为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 221 年到公元 1911 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发展阶段；余者一百多年，可以作为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从公元 1911 年到公元 2017 年的今天，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转折阶段。

显然，我们所要讨论的中国古代文明包括夏商周三代社会在内，正好处在后五千年之中的前三千年，也就是从公元前 30 世纪到公元前 221 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换言之，通常当指中国早期国家阶段，即从五帝时代到三王时代，前后约有三千年的历史。其间的五帝时代是三王时代的前奏，三王时代是五帝时代的发展，如果再作具体的划分，我们似乎可以把它划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黄帝、颛顼、帝喾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发轫期；

第二个时期：尧、舜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期；

第三个时期：夏商周三代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鼎盛期；

第四个时期：春秋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衰落期；

第五个时期：战国时期，处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转变期。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或者说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中华文明开创阶段典型代表的夏商周三代，不仅构建了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的基石，而且也构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阶段和转折阶段的根脉，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不断地传承与创新。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张闻玉先生领导的团队，经过精心组织策划，详细考证梳理，先后写作出版《夏商周三代纪年》和《夏商周三代事略》两部力作，旨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读者更加方便地走进古代历史的殿堂，从而亲近她、热爱她，最终“爱我中华”。

作为《夏商周三代纪年》的姊妹篇，《夏商周三代事略》仍然以夏商周三代历史为接续，以帝王的时代顺序为先后，着重记述重要历史事件，力争做到史时与史事结合的完整性、系统性。通读一过，应该说该书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体例独特。

这部《夏商周三代事略》新作，从其体例上看，它彰显于两层蕴意。自表言之，亦如《夏商周三代纪年》的体例，分为正编和支撑材料两部分；自里言之，亦将《夏商周三代纪年》和《夏商周三代事略》分为“正编”和“支撑材料”两部分，两者之间或曰两书之间，可以说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形成独特之体例。

其二，编撰匠心。

这部《夏商周三代事略》新作，从其编撰上看，它着眼于两观结合。自宏观言之，侧重夏商周三代发展大势，诸如朝代、疆域、都邑之变迁；自微观言之，侧重夏商周三代史事系年，诸如王年考订、史事辨析、人物评判。两观之间或曰两说之间，可以说互有侧重，互有依倚，体现匠心之编撰。

其三，学术创新。

这部《夏商周三代事略》新作，从其学术上看，它注重于两代传承。自往言之，张汝舟先生作为一代宗师黄侃先生亲炙弟子，秉承章黄学派，传道

授法；自今言之，张闻玉先生作为张汝舟大师亲炙弟子，坚守家法，推陈出新。两代之间或曰师徒之间，可以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再铸创新之学术。

自汉代司马迁《史记》问世以来，《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包括《五帝本纪》在内，构成了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古代文明史，或曰中国早期国家发展史。西汉元帝成帝之间褚先生补阙，包括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在内等，都旨在补充完善史迁巨著。《夏商周三代事略》出版发行，可以说赓续前贤遗训，追述司马迁之遗志。读者如果能够与《史记》的《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对读，也许会有更加意想不到的收获。

张闻玉先生是学术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我与张先生交往已有三十余年，也可以说，我们亦师亦友。承蒙张先生厚爱，嘱我为大著作序，师命不敢违，乃勉力为之。

后学 宫长为

2017年3月16日夜

（编者注：作者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前言

编完了《夏商周三代纪年》，意犹未尽了，总觉得还缺些什么。“纪年”毕竟只是一个框架，一个历史的大框架，而框架里面总得充实若干“金银珠宝”“奇珍异物”才算完美。于是就有了继续编著《夏商周三代事略》的构想。《说文》云：“史，记事者也。”一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必然有若干的民族故事，它们是大河中的波涛浪花。民族的文化就是由若干故事组合而成，从古到今，绵延不绝，赓续千年万年。这也是中华民族古老的赞歌，传唱数千年而不衰，还是那么悠扬，那么激昂。在关系到中华文明起源的上古三代乃至整个先秦史的研究与传播中，前辈史学家在叙事与考证研究中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甚至中小学课本都十分关注历史故事的编写与讲述。这是在传播文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

《夏商周三代事略》仍用年代的脉络，由夏而商而西周，按帝王顺次，系之以事，一路述说下来，给普通读者一个完整的交代，基本做到有根有据，论从史出，没有臆度，没有戏说。

正文是“事略”，同样也有若干“支撑材料”。这些支撑材料多是历史研究的理论架构，或是研究方法，还有些比较典型的考据性文字。我们做这样的安排，以期有助于一般读者更方便地走近古代历史这门学科，从而亲近她、热爱她，最终“爱我中华”。

全部书稿由张闻玉先生策划、统理和具体指导。“事略”部分请曾鹏先生起草一个基本文稿，由年轻学人桂珍明统筹整个文字。“支撑材料”选用前辈学者张汝舟先生三篇文字，也采用张闻玉先生许多文章，借此展示张氏师徒的学术成就。

《夏商周三代纪年》已经出版，相得益彰，《夏商周三代事略》算是她的姊妹篇，我们还是将李学勤先生的题词放在前面，以示历史学学科之史时与

史事结合的完整性。

书稿由贵州师范大学先秦史方向硕士生张良超、曹婷婷、刘小娟及贵州大学先秦史硕士生王鹏等校对，希望尽可能地减少错误，同时，这也是他们一个学习提高的大好机会。

感谢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宫长为研究员为本书撰写序文。

感谢马明芳女士对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并感谢马明芳女士校对汝舟老先生三篇文章。

感谢史可资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

本书也得到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社科基金项目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写作过程中，凡所征引海内外学者之著作，不敢掠美，均一一注明，我们在此谨致谢忱！

编著者

2017年3月20日



目录

序	宫长为 i
前言	编著者 v

正编	1
----------	---

 夏朝帝王事略	3
商朝帝王事略	45
西周诸王事略	91

支撑材料	15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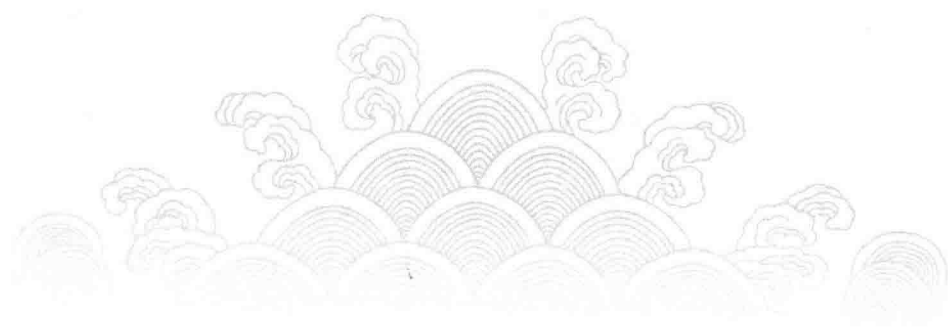
 西周考年	155
谈《豳风·七月》的用历	181
再谈屈原的生卒	187
关于虞侯政	206
关于子犯和钟	210
先秦文献与月相定点——以《尚书》为例	220
四分术的推演与应用	228
“三证合一”的研究方法	246
有关正例与变例研究方法的对话	252
从姓氏族谱看古代族邦社会	260

附录	265
----------	-----

 五帝事略	267
---	-----

参考文献	292
------------	-----

正
编



夏朝帝王事略

夏王朝积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①即自公元前 2205 年夏禹建国，至前 1735 年夏桀灭亡，传十四代，十七王，享国 432 年，其间另有后羿、寒浞代夏政 39 年，共计 471 年。

四千多年前，夏部落首领禹因平治水患有功，得到舜帝的重用，并将部落联盟首领职位禅与他，成为夏王朝的奠基人。大禹崩后，其子启继位，历史进入“大人世及以为礼”^②的“家传子，家天下”阶段，从此宣告部落联盟首领“禅让制”的结束和王位“世袭制”的开始。夏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由“世袭制”代替“禅让制”，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以血缘为纽带、族邦集团为核心的第一个王朝，也即是进入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三部曲”的“方国”阶段^③。

夏朝建立后，其统治并不巩固。夏启在位期间，发生了有扈氏叛乱的“甘之战”以及王室内部的“武观之乱”。太康即位后，畋游无度，最后被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篡夺了统治权，史称“太康失国”。后羿“因夏民以代夏

① 《史记》卷二《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89 页。

②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二十一《礼运》，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583 页。

③ 苏秉琦先生将中国国家起源的发展阶段概括为“古国—方国—帝国”，并论述道：“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的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 4000 年前。……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这时期一是群雄逐鹿，一是从洪水到治水。……治水需要打破小国界限组织起来，……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22—123 页。

政”后不久，便疏于朝政，沉溺游猎，而委大权于寒浞。寒浞得势后，杀后羿而代之，自立为王。后羿、寒浞执掌夏政长达39年之久。后来，帝相之子少康与夏遗臣伯靡联手，起兵打败寒浞，恢复夏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自少康至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八代统治期间，夏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至夏朝第十三个帝王孔甲在位时，“好方鬼神，事淫乱”，引起诸侯叛乱，政治动荡。夏朝的统治危机逐渐显现，国势衰颓。自孔甲至皋、发，到桀四代便遭遇亡国之祸。故《国语·周语》曰：“孔甲乱夏，四世而陨。”^①夏朝末代帝王夏桀在位期间，无德无道，杀关龙逢，绝灭皇图，坏乱历纪，残贼天下，贤人遁逃，淫色慢易，不事祖宗，大肆兴兵，对外征伐。成汤以讨伐暴君夏桀为名，发动灭夏战争。夏桀兵败，死于南巢，夏朝宣告灭亡。

夏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国家政权，确保统治阶层的利益，并且扩大疆土，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治国方略：立官制，分等级；作《甘誓》，平叛乱；做甲矛，强军队；灭内患，伐夷狄；定《禹刑》、设圜丘；制《禹贡》，收赋税；等等。

夏朝统治者重视发展农业，制作了大量以木石为主、兼有部分骨器与蚌器的农具，以满足农耕活动与提高生产力的需要。《国语·周语下》曰：“嘉祉殷富生物”和“养物丰民人”^②，都是追述夏禹治水，不仅减少洪水泛滥所造成的灾害，而且又引水灌溉农田，使夏代的农牧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相传夏朝时期制定的《夏历》^③，也是指导科学发展农牧业的重要举措。农牧畜业的发展，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夏朝统治者重视采矿冶炼、手工业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我国考古专家学者们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村发掘出的大量的青铜器、陶器及大面积宫殿遗址群表明，夏朝已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并且较好地掌握了冶金与

① 《国语》卷三《周语下》，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3页。

② 《国语》卷三《周语下》，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6—97页。

③ 张闻玉先生认为：“《逸周书·周月》载，‘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夏数，指以寅为正的夏历。得天，得天地之正理，即寅正符合时令。这里说，夏历是前代百王都采用的。颜渊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首先提出‘行夏之时’，强调使用夏历。我们今天行用的农历，就是以寅为正的夏历。”详见张闻玉：《汉字解读》，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铸造技术。与石器时代相比，青铜时代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越绝书》所载风胡子之言，“禹穴之时，以铜为兵”^①，大抵是可信的。此外，《世本·作篇》有“仪狄始作酒醪”“少康作秫酒”^②等的记载，说明夏朝已经掌握了酿酒工艺技术。这些都是当时科学文化水平的见证，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的见证。

一、夏朝疆域及行政区划

夏朝处在由部落联盟的高级形态“古国”到方国的过渡时期，大概没有像后世统一帝国那样明确的疆域界限。夏族与其他部落的关系，很大程度就像是宗主国与朝贡国一样；也有些方国是受夏室分封的，就如同诸侯国，如少康六年，封少子曲烈于郛地，建郛国等，故仅能以势力范围来表示其影响力。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它们分布的自然区域，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③。

夏王朝强盛时，统治的疆域大致西起今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处；北至河北省南部；南接湖北省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其势力延伸到黄河流域，甚至抵达长江流域。《史记·殷本纪》亦载成汤所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④。郑杰祥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四渎，实际应该是夏王朝四方领土的大致界线。……值得注意的是这四条大水所围绕的范围与上述夏人各姒姓方国的分布的地域基本重合，也与上述夏代诸王的活动地域基本重合”^⑤，这就再次说明西起华山以东，东达豫东平原，北至济水以南，南至淮

① (汉)袁康、吴平辑录，俞纪东译注：《〈越绝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② 《世本》秦嘉谟辑本《作篇》卷九，(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62页。

③ 郑杰祥：《夏史初探》，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3页。

④ 《史记》卷三《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7页。

⑤ 郑杰祥：《夏史初探》，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7页。

河沿岸，在这东西长约七百千米，南北宽约六百千米，面积约五十万平方千米的地域内，应是夏王朝大致的疆域范围。

（一）夏朝九州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后划分的“九州”分别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

（1）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三面距河，是各州贡道必经之处。（今山西全部、河北境内、辽宁西部的部分地区）

（2）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今山东西部、河北东南角的部分地区）

（3）青州，浮于汶，达于济。（今泰山以东之山东半岛的部分地区）

（4）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今淮河以北之江苏、安徽，以及山东南部的部分地区）

（5）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今淮河以南之江苏、安徽以及浙江、江西北部部分地区）

（6）荊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湖北、湖南衡山以北、江西西北端的部分地区）

（7）豫州，浮于洛，达于河。（今河南大部、湖北北部、陕西东南、山东西南角的部分地区。）

（8）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今四川大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端的部分地区）

（9）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今陕西北部、宁夏全部、甘肃、青海的部分地区）

也有人说，《汉书·地理志序》所云：“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①只是战国时期的人对天下区划的臆测和传说。他们认为，“夏”作为国家形态还处于萌芽阶段，是由多个部落联盟形成的松散型的臣属关系的国家，其核心统治权力辐射一般不出都邑腹地，京畿之外通过氏族制的封邦建国（即诸侯和方国），以及通婚结盟建立关系。

^①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23页。



对于“九州”是否存在，是否向壁虚造，各派学者见仁见智。我们认为文明演进自有其根脉，在没有绝对的证据下，一味地以默证法来否定传世文献大抵也非科学之态度。在综合分析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以为邵望平先生以考古学视角综合考辨《禹贡》所载“九州”说最为允恰。她认为：“黄河、长江流域龙山时代是文明的奠基期，而龙山文化恰恰与《禹贡》九州的范围大体相当。”她在综合考察黄河、长江流域古文化区系和风土人情之后又说：“但总的看来，说《禹贡》‘九州’黄河长江流域是前第3000年前间已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当不致十分谬误。”在此基础上，“关于夏王朝的史迹，先秦古籍中有零星记载，传说那时已有了文字、历法、青铜器、战车及一套国家管理制度，有大禹治水的伟业，还有‘执玉帛者万国’。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如果比较谨慎地看，夏文化仍在探索中，现被泛指为龙山文化的诸遗存中，也许就有属于夏王朝及夏代邦国的遗存”，“诸如此类的内容都使笔者不断然否定九州概念源出夏代之可能，……九州部分是有三代史实的依据的。……所以笔者认为‘九州篇’是前第2000年间的作品，而含有三个部分（导山、导水、五服）的《禹贡》倒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修订、补缀、拼凑，又经后世几番折腾才成为现今这个样子的。‘九州’基本内容之古老、真实，绝不是后人单凭想象所能杜撰出来的”^①。詹子庆先生也从人文地理角度肯定“到了夏代，作为人文地理观念的‘九州’，必然是存在着的事实。进入西周时代，‘九州’作为区划名称大致已固定下来。到春秋战国时代，‘九州’区划则与诸侯国疆域相吻合”^②。

（二）夏后启铸九鼎

据《左传》和《越绝书》载，夏朝初年，大禹划天下为九州。夏后启继位后，令九州贡献青铜，铸造九鼎^③。事先派人将标志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绘制成图册，再由工匠将画图分别摹刻于铸鼎之范加以铸

① 邵望平：《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6页。

② 詹子庆：《走近夏代文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2页。

③ 关于夏铸九鼎，历来存有两说，即禹铸九鼎和启铸九鼎。赵中文先生通过对比先秦、秦汉文献发现，启铸九鼎的说法源于先秦，而禹铸九鼎则源于汉代，故“启铸九鼎之说更合理”，本书亦从之。详见赵忠文：《九鼎考略》，《人文杂志》1990年第2期，第89—90页。



造。一州一鼎，分别是：冀鼎、兗鼎、青鼎、徐鼎、扬鼎、荆鼎、豫鼎、梁鼎、雍鼎。九鼎象征九州，显示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夏王顺应天命，已成天下共主。《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①《左传·宣公三年》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②《史记·周本纪》曰：武王“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又云：“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惮狐。”^③铸鼎以象九州方物，载方便民众生产生活的同时，更具有深层的宗教思想因素，保证君主能够“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故夏保国先生认为，“‘铸鼎象物’所体现的核心理念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王权统摄神权。这是其深刻的政治意义”^④。而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楚庄王即观兵于洛邑，“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楚王的无理要求，“在德不在鼎”，并申说周有天下即是“天所命也”，而今“周德虽衰，天命未改”^⑤，此即人们借助九鼎在巫术神权控制下，捍卫王权、巩固国家政权的最直接体现。

镂刻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九鼎是夏商周各代帝王“定鼎”政权的镇国之宝，随着改朝换代而自夏搬迁至商，再至周，……几千年来，九鼎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国之重器。令人遗憾的是，象征国家的国之重器九鼎早已不知所踪。《史记·孝武本纪》中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⑥国人盼望有揭破这个千载之谜的一天，或许也就是九鼎重见天日之时。此外《史记·封禅书》记载九鼎的流向存有两说（其一说已见上文），“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⑦。

① 《墨子》卷十一《耕柱》，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41页。

② 《左传》卷十一《宣公三年》，（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46页。

③ 《史记》卷四《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6—169页。

④ 夏保国：《先秦舆论思想探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82页。

⑤ （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卷十《宣公三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46页。

⑥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65页。

⑦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65页。